# 第一编

# 老子：无为之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老子这个人颇有点神秘色彩，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了传，可据说那四百多字的传记，除了他的出生地一句话“老子者楚苦县曲仁里人也。”(即今河南鹿邑县)尚未引起怀疑外，其他内容无不产生争议（这句话如今也有争议了）。即如对“老子”这个称呼中的“老”字，理解便很有歧义。有人说这个“老”是尊称，即现在人所说“老先生”中那个‘老’字的含义，可有人却认为这个“老”就是他的姓；而司马迁所说的他“姓李氏”却不大可靠，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李”这个姓氏还未出现。

据记载，孔子曾经特意去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一些问题，看来他比孔子年长，应算作孔子的老师。不过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他所担任的“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是个无职无权的清水衙门。后来看到周朝也不大景气，他连这个清水衙门也不愿意呆下去了，弃职而去。去到哪里？不知道。从他自洛阳骑青牛过函谷关来看，大约是投奔西方去了。最后在哪里落脚？这连司马迁也不知道，“莫知其所终。”由于这种神秘，后世人便将他看作神仙。

他的《老子》这本书是被逼出来的，据说他要通过函谷关时，把守关门的小头目不放行，以命令的口吻说：“你这就要远走高飞了，一定要给我写出一部书来！”看来这个守关吏也非寻常之辈，决不是那种“要从此关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大王式的人物。幸亏有了他的这次强迫，老子总算将他的思想部分地留了下来，为此，我们真应该感谢这个守关吏。也许由于

守关吏督催太急，也许由于老子不太心甘情愿，所以他只写了五千余字，是先秦诸子中字数最少的一部。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不朽的价值。

这部书，有人说它谈的是哲学，是言简意赅的“哲学诗”有人说它谈的是政治，甚至是教人以权谋诈术的阴谋书。其实二者并不矛盾，从对自然的认识而言，它谈的的确是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规律；而从对社会人事问题的认识而言，它谈的就是政治，既从政治思想的层面上去谈，也从政治操作的层面上去谈。老子虽然担任过公职，但严格的讲，他并没有从过政，即没有掌握过权力，可通读全书，我们不得不叹服老子政治思想的深刻和政治操作手段的高超。

# 第一章　以道为本

## 一、模糊原则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译文】**

**道，如果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名，如果也可以用语言概括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名。**

### 《老子》是痴人说梦吗？

**老子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居然推出这么个观点，实在是很令人惊异。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主要是指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名，指的是概念。如果道及名都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述的话，《老子》的五千言岂不全是痴人说梦，或者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那又何必“道”出来呢？这岂不是老子的自我否定吗？老子还说：“知（知，即智）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一点，唐代的白居易早已提出质疑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不只如此，老子实际上否定了所有的理论、学说、思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然主要是人文学科），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思想，无不是在阐述它们自己的“道”，如果“道”是不可道的，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思想家、理论家汗牛充栋的著述，岂不全成了“满纸荒唐言”？

然而，老子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一家学说，一种理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认识了“常道”，即永恒的真理。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本身，真正的“道”，即它们的本质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目前人类所道出来那些“道”，都只具有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价值。一个时期被奉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万世不易的“道”，过了一个时期回头再去看，很可能是片面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太多太多了。

## 《红楼梦》的命义是什么？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曾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义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到了后来，同是革命家，有的说它是写吊膀子的，有的又说它是讲阶级斗争，近来，又有人说它是写佛，写禅；直到今天，《红楼梦》的命义，即它的“道”，也还是众说纷纭。看来，《红楼梦》的“道”也是永远不可道的了！

岂止《红楼梦》，任何一种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著作，人们对其命义的理解都是各有不同的。例如《论语》，它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仁”还是“礼”？它是安邦济世的良方，还是阻碍进步的惰性力？再例如《老子》，它的“无为”，究竟

是揭示了大自然发展变化的本质，还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它究竟是哲学诗，还是阴谋书？

《红楼梦》再伟大，它毕竟只是一部小说，无关宏旨，如果是一部用以指导立国治民的经典，而不同的执政者又各有不同的解释，那问题可就麻烦了。不幸的是，这种麻烦还真的出现了。任何以立国治民为己任的著作，尽管它立论的角度各有不同，究其本意而言，它还是要治国而不是乱国，还是要爱民而不是残民，只要这个基本命义不差，理解上多少有些歧义，这既不可避免，也不会出大的乱子，如果连这个基本命义都搞错了，那问题可就大了。

## 歧路亡羊的悲哀

一部小说的“道”尚且如此纷纭，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的“道”就更加难以严格界定了。于是我们在历史及现实中，便看见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都是信奉同一种学说，一种理论的信徒，彼此对这学说、理论的核心即“道”的理解都各不相同，或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谁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嫡传的，对方是歪曲的，荒谬的，叛道的。谁都能从那理论、学说的创始人的著述中，摘录出只言片语，振振有词的证明自己的正确，使旁观的人，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从。这实在是学说的悲哀，理论的悲哀。这令我们想起了《列子》一书中讲述的这么一个故事：

杨朱的邻居丢了一只羊，他既全家出动寻找，又请列子家的童仆帮忙。杨朱道：“唉！丢了一只羊，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邻居说：“岔路太多。”过了好久，找羊的人都空手而返。杨朱问：“找到了吗？”邻居说：“没找到。”杨朱问：“怎么还是没找到？”邻居说：“岔路之中又有岔路，不知道羊究竟跑到

哪里去了,只好回来。”

杨朱一听，怅然若失，久久没有说话，整天也没露个笑脸。他的学生很奇怪，问他：“一只羊能值几个钱，又不是先生您的，您却这样闷闷不乐，这是为什么？”杨朱也不回答，学生们始终也没能了解他的心思。

他的一个学生孟孙阳将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一天，心都子与孟孙阳一起来见杨朱，对他说：“从前有兄弟三人在齐鲁一带游历，跟从同一位老师学习，掌握了仁义的道理以后回到家中。他们的父亲问：‘仁义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老大说：‘仁义的道理使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把名誉放在后面。’老二说：‘仁义的道理使我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三说：‘仁义的道理使我既保全生命又获得名誉。’他们三个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同是出自儒家，到底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

杨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讲起了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一直住在河边，熟悉水性，勇于游泳，以划船摆渡为生，赚的钱能养活百口之家。自带粮食前来向他学习游泳的人成群结队，但，淹死的人几乎有一半。他们本来是来学游泳的，而不是学淹死的，而得利与受害竟如此截然不同，你以为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

心都子听了以后，默默走了出来。孟孙阳责备他说：“你干嘛问这么个叫死理的问题，老师又没正面回答，我越来越糊涂了。”心都子说：“大路由于岔道太多而丢失了羊，而追求学问的人，也因为对治学方法理解的不同而丧失生命，他们学习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本观点也没有什么不一致，而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之大。看来只有回归到原来同一的起点之上，才不会迷失方向。”

由于担心歧路太多而不去找羊，是懦夫：迷失于歧路之上

而找不到羊，是无能；回归到起点之上，固然不会迷失方向，却也永远不能再前进这真是人类的两难选择。但人类宁肯在歧路上摸索，即使跋涉得精疲力尽，磕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能回到起点上，那个让人类无比神往的“羊”，总头一天会找到的。否则，人类只好回到树上去结巢而居了。

## 孔子留下的难题

列子那个邻居的困难比较好解决，岔路再多，而羊毕竟只一只，再多发动一些人，多费一些功夫，总能将羊找回来的。而那兄弟三人的问题则比较麻烦，究竟他们三人，谁真正得到了儒学的真谛，即儒学的那个“道”？看来老大说的有理，因为孔子分明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老二说的也有根据，他依据的是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老三说的也有根据，孔子还有一句名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颇类似文革期间对立的双方打派仗一样，都有孔子的语录为证，都是孔子的最高指示，究竟谁是谁非？大概谁也难以作出评判。这就是孔子给后人留下的难题。

其实，孔子留下的难题还不只如此，他本人的是非功过，就是留给历史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几千年来，他以及他的学说，大起大落，罪之者以为“儒以文乱法”，焚其书，坑其人；尊之者，称其为“至圣先师”，其学说为治国之经典，救世之良方，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独尊的地位；就这样过了几千年，忽然又说他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衰败的罪魁祸首，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大拦路石，举国上下都喊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到了“四人帮”时期，他又成了复辟倒退的祖师爷，他的学说成了集中国落后、腐朽、反动思想之大成，其遭遇之悲

惨，比起在秦始皇时代大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又有人说，孔子及其学说，不只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法宝，也是拯救人类社会未来，使其免于毁灭的最佳药方。

孔子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师，他的所谓学说也不过是五万余言的一本《论语》，除掉其中一般表述性的文字，真正具有思想含量的，也不过三分之二左右，其褒贬毁誉何以如此天悬地殊？他的“道”到底是什么？大概到今天也无人能够道出吧！

像这样的遭遇的又何止孔子一人，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政治家不都曾经或正在遭遇着类似的经历吗？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大凡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其学说即使算不上博大精深，至少也是多义性的。哪怕是对于同一个命题，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也会有不同的阐述，孔子对“仁”的说法就有好几种，如果学习者、研究者各执一端，那么，这个“道”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 学泳者的悲喜剧

列子写了学习游泳者的两种不同的结局：有的人掌握了一技之长，不再有衣食之忧，而另一些人则被淹死。列子真不愧是伟大的预言家，他似乎预见到了在理论的大海中游泳者的不同命运。

这种理论的多义性，固然给学者们带来无穷的麻烦，却也给政治家带来极大的方便。这给了他们以极大的灵活性，当现实的斗争需要他们执行某种政策时，他们可以从学说、理论的那多义性的“道”中拈出一支，以证明自己的正统；时易世迁，当新的斗争需要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执行另一种政策时，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又可以拈出“道”的另一支，以证明自己

仍然是原装正统。“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只有真正理解、掌握了“道”的这种玄妙，才算真正掌握了从政的奥妙。

不过，这种理论的多义性，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悲剧。对这种多义性的探讨，如果只是在学者之间，在理论的层面上进行，即使是观点无论多么对立，态度如何互不妥协，也不过是学理之争，最坏的后果也不过是形成一些门户之见而这种争论一旦进入政治层面，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在专制制度之下，政治是不允许百花齐放的，它只能是一家独裁。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道”，凡是持有异议的，无不被斥为异端邪说，是决不允许存在的，轻则逐之，贬之，重则关之，杀之。然而这也只是在独裁者鞭长所及的范围之内，假如这些异教徒是完全有力量与之抗衡的他国之君，他国之臣，贬官、杀头都无能为力了，那怎么办呢？攻之，骂之，咒之。于是我们在历史上便见到许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理论大战的悲剧。

## 二、遵循规律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译文】

自然的规律，是不用争辩而善于取得胜利；不必说出而善于应验，不用召唤而自动存在。

###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到……

“道不可道”并不等于“道”的不存在，在人类社会，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自然中，在宇宙中，那个“道”一直存在着，并冥冥中一直在主宰着一切，它“不可道”，更不可违，违背了它，是要吃大苦头的。

就说所谓“天之道”，即宇宙的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吧，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未能道个明白。先是公元二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主张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行，这个学说一直存在了一千多年。到了十六世纪，这个学说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太阳处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运转。这个发现，被称为宇宙观的大革命。然而，现在的科学证明，这个观点也并不正确，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宇宙有没有中心，至今人类还是一片茫然……

这种“道”，虽然人类至今还没有完全掌握，但谁也无法违背，哪怕是至高无上的罗马教皇，权力无边的宗教审判所，他们可以烧死哥白尼，却无法让太阳围着地球转。

## 人间正道是沧桑

日月行焉，四时兴焉，天何言哉？大自然的寒来暑往，日出日没，潮起潮落，有自己的规律，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这个规律有的已被人清楚地了解，有的虽然尚未被完全了解，但也在严格遵循着。任何人想自称高明，声言这个规律是他发明的，或者想一手遮天，隐瞒这个规律，或者极端狂妄，想去改变这个规律，都会被碰得头破血流，遗笑千古。例如所谓亩产粮食几万斤、十几万斤、几十万斤等，这个农业史上的闹剧，已经以其愚昧荒诞，被写进了史册。

那么，人类社会有没有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呢？自然是有的，千百年来，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志士仁人都在探求这个规律，有的人声称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规律。自然界的规律，哪怕是像天体运行这样玄妙的规律，都是可以通过观察、实验、运算来加以检验、证明的，是具有可重复性的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却不具备这种可能性，它既不可能通过运算得出正确的答案，也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它都是一次性的，永远不可能重复，既不可能纵向的重演，也不可能横向的移植。大唐盛世是中国人的骄傲，可那样的盛世在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某国号称世界第一强国、富国，可将它的那一套照搬到另一个国家也未必行得通。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无规律可循的，不，它也有，只是它不像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按部就班，周而复始，表面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可循，有时，表现甚至是杂乱无章，无序的，曲折多变的。一般的芸芸众生根本就无法认识和了解。因此，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有的时侯，有的国家不免卷入急流险滩而遭灭顶之灾；有的时侯，有的国家又会搁浅于浅滩而停滞不前；有的时候，有的国家却“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顺利地航行于历史的长河中。这其间，就是“道”，也即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冥冥之中起着作用。

老子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谁想要有天下而随心所欲地去改变它，我看他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天下，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是不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的，如果一意孤行，就必然失败；如果还执迷不悟而不改弦另张，就必然会失去天下。……）

老子的这一段话是太正确了。他指出，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原则，即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行事，而绝不可将个人不切实际的主观意志强加于历史。

可是，在历史上便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以先知自居，以哲人自居，以思想家自居，声称自己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将这个所谓的规律强加于社会，要求历史的长河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流向。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些人如果不是骗子，便是野心家，是狂徒，或者是几种人的综合体，当他们将他们所臆想的那个规律强加于人类社会时，带来的便是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历史的发展也因他们的这个所谓规律而受挫、停顿、折转。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规律毕竟是不可抗拒的，它默默地、坚定地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而将那些临驾于它之上的狂人们抛了下来，摔得粉碎。

## 秦朝亡于四个字

汉朝的贾谊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过秦论》，所谓“过秦论”，其实就是“论秦过”，即论述秦朝的过失。这篇文章几乎就是一部秦朝简史，文章分上中下三篇，从秦孝公一直说到子婴，重点在分析秦朝从扫荡六国、统一天下到顷刻瓦解的原因，这个原因，贾谊归结为四个字：“仁义不施”，这就是全篇立论的基础。

秦王朝的“仁义不施”，已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不止是表现在最为后世所诟病的焚书坑儒上，说实在的，别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即使坑的再多一倍，它也不至于灭亡；更主要的表现在它对待老百姓的惨毒上。一百余年列国争强的战争，天下烽烟遍布，百姓居无宁日，也不知流了多少

血，死了多少人，光秦将白起一次活埋赵国的降卒就多达四十余万，可见这场百年大战的惨烈。如果说那是战争，死人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好不容易天下统一了，百姓多么盼望能够息一息肩，喘一口气，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这个要求并不高，秦始皇父子只要能够多少满足一下百姓的这个愿望，天下的治理本来是不难的。贾谊说，当时的老百姓无不伸长了脖子，观察这个新的王朝的政治举措，那些长期处于战乱，生活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是最容易满足的。普天之下处于困苦之中，这对新的王朝是一笔可贵的资本，是最好管理的时机，不需要什么雄才大略，只要有中常的智力，就可以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

可惜，秦始皇打天下有术，治天下无方，他在天下太平之后，依然实行战时体制，无偿地征用大批的民力，来为自己修宫殿，修陵墓，光一处的工地上，便聚集着七十余万人之多，试想，当时的中国才能有多少人？而且管理的手段又极其残忍，那些侥幸没有死在战场上的人们，又都死在工地上他的儿子秦二世，功勋威望不及乃父，而残忍刻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才有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才导致了秦王朝的二世而亡。

什么叫“仁义不施”？就是不把人当人，完全无视人的最起码的欲求、权力。人的最起码的欲求、权力是什么呢？首先是要能活下去，其次是希望能尽量活得好一点。按现代人的说法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及现实上看，只要能够满足这两项要求，便是施了仁义，便叫“有道”，这个王朝便能立足，这个社会便会进步；否则，便是仁义不施，便叫“无道”，便要完蛋。试看陈胜、刘邦的起义，便是因为率领戍卒赴朝廷服役，由于误了工期，知道难免一死，这才铤而走险。

以上所说，卑之，无甚高论，写书人决没有狂妄自大到自以为发现了人类社会的“道”，但，可以自信的是，以上所说两项，必定是“道”的主要内容，没有了这两项的“道”，绝对不是什么“正道”

古今中外，有那么一些最高掌权者，自以为雄材大略，有气吞河山之志，有经天纬地之能，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左右历史，一时之间也折腾得风风火火，沸沸扬扬，而结果呢，无一不是碰得头破血流。

从历史上看，违背这个道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想让社会向前发展，不想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而是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将人们拖进了苦海，即贾谊所说的“仁义不施”。秦始皇是这样，隋炀帝是这样，慈禧是这样，希特勒也是这样。另一种情况是，不遵循“循序渐进”四个字，想一步登天，一口吃个胖子。结果都是“不终朝”“不终日”。

## 王莽也亡于四个字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就是“奸臣”的代名词，铁案如山，万劫不复。后来也曾有些人想给他翻案，但响应寥寥。按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看，他以臣代君，是地道的篡夺，是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罪名，这个案是翻不了的。看来，这顶“奸臣”的帽子还要千秋万代的戴下去。

如果抛开传统的政治观念，按照现在的政治运作方式来看，王莽又错在哪里呢？现在最高掌权者的更迭，不都是以臣代君吗？西方社会每当大选开始之时，竞选者总要将当时在位的领导人骂个狗血喷头，按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和法律，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现在的人们不是也都认为十分正常吗？因

此，以今天的观念来评价王莽，他的那顶“奸臣”的帽子是应该摘掉，应该平反的。即使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看，中国历史上，以臣代君的事还少吗？哪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不是以臣代君？何独对王莽的尺度那么严格呢？而且，王莽的取代汉政权，不动一刀一枪，不费一兵一卒，采取的是传说中的“禅让”，即和平过渡方式，比起刘邦、朱元璋之流的长期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血流漂杵，代价最小。可拉旗造反的，倒是明君圣主，请君让位的、倒是奸臣叛贼，这公平吗？而且后来采取王莽式的手段取得政权的，也大有人在，如曹操、曹丕父子、司马懿、司马昭父子、刘裕、萧道成等南朝的许多皇帝，一个个都名正言顺，唯独王莽一人被扣上了奸臣的恶名，这公平吗？王莽并没有给写书人送礼包，写书人也无意给他翻案，只是觉得中国新旧史学家们脑子中那种“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太根深蒂固了，假设王莽的新朝能够多延续几代，恐怕对他的评价就又是一种样子了。

然而，不幸的是，王莽毕竟是失败了，他失败的原因也是四个字“托古改制”。

当王莽走上政治舞台时，西汉已经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按旧时的说法，气数已尽，败亡的迹象已显露出来了，这种显露，从汉元帝时，即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入主后宫时便已露出端倪。当时有个叫京房的儒生问汉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汉元帝无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到汉成帝以后每况愈下，主要表现为土地高度集中于豪强大地主的手中，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商人手中，以及他们对奴隶的大量的人身占有如汉哀帝的宠臣董贤，一次得到赏赐的田地便有二千余顷。这已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声势日渐浩大，西汉政权已岌岌可危了。当时有些有识之士也曾提出一些补救的办法，如宰相孔光、何武等曾提出王侯、宫吏、富豪占田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